

新疆的青铜时代和 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韩建业 著



文物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4CKG001)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北京联合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新疆的青铜时代和 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韩建业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7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校对 周兰英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王 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韩建业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10-2106-2

I. 新… II. 韩… III. ①青铜时代文化—研究—新疆
②考古学文化—研究—新疆—铁器时代 IV. K87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709 号

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韩建业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9.75

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0-2106-2 定价: 80 元

作者简介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67年出生。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200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北京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等。

内容提要

本书从文化分期、文化性质、来龙去脉和对外关系诸方面，对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新疆地区从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第2千纪末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偏早阶段，公元前第1千纪中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偏晚阶段。新疆虽然可分为东西两个文化系统和若干个文化，但内部联系日益增强，总体自成体系。同时，新疆与周邻文化始终存在密切交流；以新疆为纽带而形成的早期东西文化通道，应当是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且曾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序 一

严文明

新疆古称西域，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公元前 138 ~ 前 126 年前汉张骞通西域时有 36 国，后汉时有 55 国，那多半是依托绿洲建立的城邦小国。自从汉宣帝于公元前 60 年设西域都护，统辖西域，这地方才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治之下，同时也便进入了中国正史的记载。至于汉代以前的历史，只有一星半点的传说，不足征信。要把这一段历史逐渐追寻出一个眉目来，就只有依靠考古学家的努力了。

新疆考古虽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那时英、法、俄、德、日等国学者或探险家纷纷造访此地，肆意掠走了大批文物。之后也做了一些研究，但对于汉代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没有摸到一点皮毛。虽然如此，新疆却因此成了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场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新疆的考古学者做了不少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得了许多资料。而汉以前考古工作的突破则是在 80 年代以后。以往出土细石器或彩陶的遗址多被定为新石器时代，那是不确实的。80 年代初，长期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的陈戈和王炳华发表文章，分别提出划分新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问题。陈戈后来又明确提出要划分新疆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问题。学术界大多同意他们的说法，只是划分的具体年限和界标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近些年来，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又有不少新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有所不同。以新疆之大，自然地理环境之复杂，各地考古学文化出现较大差异原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如何分辨和正确解读这些差异。如果不分年代早晚，笼统地将各地区的文化进行比较，就不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因年代不同而发生的差异，哪些才是同一时期因为某些原因而发生的地方性差异。要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差异分辨清楚，首先就必须对各个地区的文化遗存进行分期。而各个地区的分期又必须建立在各个遗址或墓地本身分期的基础上。事实上，遗址或墓地本身的分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要有地层根据，二要有标型器物以便进行全面的标型学研究。可惜在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众多遗址和墓地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够充分。一是可利用的地层（包括墓葬）叠压打破关系不多，二是作为标型器物的陶器在墓葬中并

不很多，而且往往不成组合。而遗址中不同层位的陶器可资对比研究者更是十分有限。这两个条件不充分，细致而准确的分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退而求其次，还是从陶器入手，尽量把墓葬进行归类，也就是分组。再参照个别地层关系，大致排出各组的先后次序。然后把各个地区的分组进行对比，以便相互验证或进行个别的调整，还是可以划分出总的分期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参照碳-14测年的数据，也可以大致确定各期的绝对年代。韩建业在本书的研究中正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是在现有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方法。但是这个分期并不是文化的分期而只不过是相对年代的排比。要进行文化分期还必须考虑全部遗迹遗物的变化，全面估价各期之间的关系和前后变化的幅度。本书作者正是在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后，把五期合并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青铜时代，第二、三阶段是早期铁器时代。

新疆那么大，民族那么复杂，在汉代乃至汉以前已经是小国林立，表现在考古学遗存上必然是多种文化并存。本书开始所作的十个地区的划分和后来进行的三个阶段的划分都不是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十个地区主要是根据自然地理单元和考古工作的情况而初步设立的，是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结果。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要在各个地区的分期和相互比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范围内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划分原则，反复比较推敲才能够确定的，绝不可以只依据某些个别因素的相似而随意圈定。本书将新疆青铜时代划分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古墓沟文化、安德罗沃沃文化和克尔木齐类遗存等四类遗存。早期铁器时代则划分为焉布拉克文化等四个文化和香宝宝等两类遗存。这里的遗存也可能是一种文化，只是因为有些情况还不大清楚而暂时称为某某遗存罢了。两个时期的文化有继承也有一些变化，即使早期铁器时代两个阶段的文化也有一些局部的变化，书中对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作了一些分析。有的文化之下还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而在文化之上又可以归纳为不同的系统。在青铜时代，可以划分为东部的带耳罐文化系统和中西部的筒形罐文化系统。如果从经济文化类型来划分，则可以将东北部的克尔木齐类遗存划分为畜牧狩猎经济文化区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在早期铁器时代，大部分地区可以划分为高颈壶文化系统，而西部则为圜底釜文化系统。这时期经济生活上也有一些区别，北疆可能是游牧经济，而南疆依然是半农半牧经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作为交通工具的马和骆驼的利用，加大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新疆或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的面貌也日益显现出来。这样就在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或比较完整的文化谱系分析，从而对新疆的考古学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本书第四章以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各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交互关系。尽管许多学者就这类问题发表过各式各样的意见，但多是从某些文化因素出现的早晚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立论，而不是以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和详细的谱系研究为基础，缺

乏整体的把握，因而显得单薄而欠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研究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应当指出的是，讲新疆青铜时代文化的来龙也就是起源问题，自然首先要了解当地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可惜直到现在，新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还不清楚，无从进行比较研究。我相信这不等于新疆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或发现了而没有认识到。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到现在还不清楚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什么样子，那它本来就可能不是很发达。当受到发展水平很高的邻境文化的影响时，必然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日本的情况也许可以作一参照。那里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还比较发达，因受大陆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弥生文化不但迅速替代了绳纹文化，而且连人的体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疆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新疆很大，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很大的差别，接受外部影响的情况各不相同。从外部情况来看，新疆的东西两边都有很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西边的中亚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迅速影响到南西伯利亚等周边地区。其中安德罗诺沃文化直接发展到新疆西部，南西伯利亚的阿凡那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则从西北影响到新疆，使新疆全境逐渐进入青铜时代，并形成若干具有一定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可以概括为筒形罐文化系统。新疆东部的甘肃、青海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以至四坝文化，发展的方向一直是从东往西。当一部分马厂期和四坝文化的人群到达东疆的哈密地区时，与东进的青铜文化发生了遭遇，两者碰撞融合而产生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从文化特征来看可以称之为带耳罐文化系统。在这个时期，新疆各青铜文化的居民大体都是不同类型的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只进到东疆的哈密地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就是两大人种和两种文化会聚所产生的一种复合文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与带耳罐文化系统有较多联系的高颈壶文化系统占据了全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人种也逐渐向西移动；而与筒形罐文化系统关系密切的圜底釜文化系统则仅见于帕米尔一小块地方。尔后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新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并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即使在这时，在新疆的广大地域上，具有西域特色的文化仍然鲜明地展现出来而为世人所称道。

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不但全面介绍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而且依据考古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谱系，分析了这个谱系之所以形成、演变、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以及它在早年东西文化交流上所起的特殊作用。这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很值得一读。

序 二

陈 戈

韩建业写了一本关于新疆的考古著作，书名叫《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他请我为该书作序，这实在有些为难于我。我不是有名的专家学者，有什么资格为他人作序呢？更何况我虽然曾致力于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但这些成绩多半都被某些人以莫须有的理由予以否定，并剥夺了我继续从事新疆考古研究工作的应有权利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岂能再为人作序！可是建业却说他只为学术负责，仍坚持己见，实在推辞不掉，于是只好从命。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一项内容。我比较仔细地看过两遍后，觉得写得不错，至少可以说是近年来我所看过的关于新疆地区史前考古研究论著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其理由如下：

1. 是真正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统领和研究新疆地区考古的范例。过去已经发表的关于新疆考古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少，但是真正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或者比较好地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新疆考古的文章却不多见。所谓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无外乎就是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等几大项，然而在新疆地区却似乎难以贯彻和应用，其原因主要是这里的田野考古发掘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限，提供不了多少可供地层学、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研究所必须的扎实可靠的基本资料，这不但在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新疆考古研究中考古学基本方法的贯彻运用，而且使真正想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新疆考古的学者们在主观上产生了畏难情绪。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我虽然曾尽很大的努力在新疆划分出了几种考古学文化，但总感到基本资料还不够充分扎实，所以未能也不敢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理论方法对这些考古学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可喜的是，该书作者颇有勇气，敢于知难而进，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比较充分和熟练地运用到了新疆考古学研究中来。他首先将新疆地区按照地理环境和考古资料情况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小区，然后分别对各个小区内的所有考古遗存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主要通过陶器的特征和变化，对它们进行小分期；再在各个小区分期的基础上，将各个小区综合在一起，进行统一对比，总结出整个新疆地区的大分期，从而得出

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早段和早期铁器时代晚段三大时期或阶段；最后在这个大分期的框架中，运用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划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并对其文化内涵和特征、来龙去脉、相互关系以及与新疆境外各有关考古学文化的联系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整部著作方法正确，思路清晰，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2.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把握，微观细究。这部著作是研究整个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此乃大处着眼，宏观把握；但是要将这样全局性的大题目做好，则必须对每一个局部的小遗存进行仔细的探察，此乃小处着手，微观细究。作者充分做到了这一点。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大致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较多，要对它们一一进行仔细翻检和研究，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耐心，特别是有许多资料或不完整，或似是而非，或数量极少，要比较准确地利用它们或为其定性，更非易事。从本书可以看出，作者不但察看了与其书名相关的几乎所有遗存资料，而且对它们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尤其对陶器分外重视。正因为如此，所以其研究的基础是扎实的，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3. 尊重他人研究成果，阐发自己独到见解。本书的注释基本囊括了与题目有关的绝大部分文献。作者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既不盲从，也不偏否，而是通过自己的认真研究，认为正确合理的即予以肯定并吸纳之，认为可商榷之处则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既不轻易抹杀他人，也不刻意拔高自己，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使整体研究水平上升一步。这是踏踏实实、认真做学问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在当前学术研究殿堂中不时出现各种不良现象的情况下尤为可贵。

4. 本书是作者第一次研究新疆考古的作品，初次涉足，即有不凡之响，这与其比较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在攻读博士期间，整理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由田广金和郭素新夫妇发掘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编写出两大本考古报告《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和《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同时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这既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涉足新疆考古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其勤奋努力，他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在为其博士论文所作的序言中说道：“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这篇新疆考古之作也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且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勤勉严谨之风。

5. 本书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是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的新概念，在此之前只有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提法。自从提出这两个时代的概念后，对其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将过去

所谓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的诸多遗存划归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的定性阶段，有的人则仅承认青铜时代而否认早期铁器时代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年来的研究主要是纠正过去的误判或总体的概念性的论述，很少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本书作者的研究打破了这一局面且多有进步，主要表现在：

(1) 跳出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概念的争论，直接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期和谱系研究。很明显，他是同意在新疆地区存在着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但并未着墨阐释，这可能是因为他为了避免重复或认为已无必要再费笔墨。实际上，真正了解新疆地区早期考古资料的人，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并放眼中亚乃至于世界考古的话，都不会也不应该怀疑新疆地区是有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1994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关于新疆地区古代民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题目“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即很能说明问题。本书开宗明义，直指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分期和谱系，很显然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和深入了一步。如果说过去提出并确立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是一个旧阶段的话，那么现在开始研究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分期和谱系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从陶器方面论证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特点。陶器因其存在的普遍性和变化的敏感性而成为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资料和对象，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必然也都要涉及它。但是过去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对某些遗存或某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进行描述和分析，而且比较笼统粗糙。本书则是集中力量专门研究整个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既全面系统，又细致入微，而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青铜时代的陶器在中西部是“筒形罐文化系统”，在东部是“带耳罐文化系统”；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在西部是“圜底釜文化系统”，在中东部是“高颈壶文化系统”；彩陶在青铜时代少或不见，在早期铁器时代早段繁荣发达，到早期铁器时代晚段则衰落消失。这种结论，特别是关于青铜时代的筒形罐和刻划纹、戳印纹陶器特征的认识，使人有豁然一亮的感觉，也就是说将过去一些比较朦胧或模糊的印象最终以明确化。就目前资料而言，这种认识应该是正确的，而且还要指出的是，过去关于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依据铜器和铁器的有无，现在再加上陶器的特征和变化，更加证明了这两个时代的存在。

(3) 划分和确认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几种考古学文化。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正式提出和命名并已基本上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考古学文化有四种，即察吾乎沟口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但这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而属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能确定。虽然有些人曾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出或使用过这种或那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名称，但都由于资料不够充分或论述不够细密从而未能得到普遍的

认同。本书除了继续肯定并完善已经确立的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四种考古学文化以外，又新提出和确认了属于青铜时代的三种考古学文化，即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古墓沟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我认为这种划分是正确的，应该予以肯定。不过关于前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名称似乎还有再斟酌的必要：所谓古墓沟文化主要包括古墓沟墓葬和小河墓地，前者共发掘墓葬 42 座，详细资料未公布；后者将整个墓地全部清理，共发掘墓葬 167 座，虽然详细资料亦未公布，但几次发掘的简要介绍已可勾画出总体面貌，而且该墓地早在 1934 年就被试掘和记录过。因此无论从资料的全面和丰富程度，还是从发现的时间早晚来讲，将这种考古学文化定名为“小河文化”比较妥当，这一点在发掘者的简报中已经提到。所谓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主要是指哈密市内和巴里坤南湾墓地等处发现的一些墓葬，由于主要的一处墓地是在修建哈密市区内的一条名为“天山北路”的道路时发现并发掘的，所以就有人据此称为天山北路文化。本书作者考虑到此“天山北路”与新疆地理区划中早已普遍惯用并长期流行的专门术语“天山北路”有混同之嫌，故又在其前加上哈密二字以示区别，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无论如何，用“天山北路”的名称来命名哈密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名称早已有明确固定的含义，它是指新疆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或通道，“天山北路文化”必然会使人们理解为天山以北地区的文化，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又会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怀疑，即哈密本来属于东疆地区，怎么又和天山以北混在一起呢？既然“天山北路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这样的名称有欠妥当，那么这种考古学文化究竟该冠以怎样的名称才合适呢？由于这种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几处主要的墓葬发掘资料尚未全面整理出版，所以这应该是将来的考古报告编写者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个人初步认为，如果经过详细的整理，主要的陶器与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基本相同的话，似应归入四坝文化；如果与四坝文化有很大区别的话，则是否能以发现比较早的巴里坤南湾墓葬为名而称为“南湾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主要分布在前苏联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一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新疆地区过去也有其遗迹和遗物发现，但数量很少；2003 年在塔什库尔干下坂地发掘了 100 多座墓葬，明显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本书作者眼光敏锐，抓住这一新的发现，并结合过去在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少量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首次确认了新疆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而且沿用了国外早已熟知的考古学文化名称而不另起新名，这是正确的，它表示了新疆考古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好势头。作者提出的这三种考古学文化不管其名称如何，它们都已是客观存在，且都属于青铜时代，这就改变了过去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没有确认的局面，将它们与过去已经确定的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四种考古学文化联系在一起，显然使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更趋完善、系统和深入。

(4) 本书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交接点定在了公元前 13 世纪，也就是

说大约从公元前 1300 年开始，新疆地区就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这比我过去曾经提出并主张的公元前 1000 年又早出了 300 年。本来，对于公元前 1000 年这个年代，就有人表示怀疑，那么公元前 1300 年岂不更引人质疑？不过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由实践去考验，关键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在这里我想再补充两点有关资料：其一，根据近些年来对小亚细亚出土的楔形泥版文书的研究证明，在公元前 14 ~ 前 13 世纪的赫梯王国那里，铁器的生产和使用并不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数量少而昂贵、使用范围很有限且禁止外传。相反，其发展水平和生产规模都已相当不低，既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铁，也有许多不同的制造地点，还有专门从事铁器制造的作坊和工匠；既有利于寺庙和宫廷的祭祀用品和贵重装饰品，也有普通的日常用品和生产工具及武器，还有专供出售买卖的铁块。而在安那托利亚一带，也发现公元前 1600 ~ 前 1200 年甚至早到公元前 2100 年的各种铁器，如别针、垂饰、镞、印章、钉、针、凿、斧、刀、矛、剑、人像等。其二，哈密五堡水库墓葬的几个碳-14 数据基本上都在公元前 1300 年左右，发掘者最初将其定为新石器时代，但曾亲口告诉我说在一座墓葬的底部出土了一件小铁刀，并表示不解。后来这些墓葬又被改定为青铜时代，但再未提起铁器。非常巧合的是，2001 年底我被邀参加中法联合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时，在乌鲁木齐市与原哈密地委副书记万兆坤先生聚会，在座者还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伊弟利斯、副所长张玉忠、所长助理刘国瑞等人，闲聊中万兆坤先生谈到了这样一件事：五堡水库墓葬进行完第一次发掘之后，发掘者又要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前他对当时主管哈密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万书记说，第一次发掘时出土了一件铁器，这次发掘就是想再验证一下还有没有铁器。但是发掘完毕之后，关于铁器的有无再未明确提及。这件事情说明，哈密五堡水库墓葬极可能确实发现过铁器，而且当时很引人重视。由于这些墓葬的正式发掘报告尚未公开发表，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对我们考虑新疆铁器的出现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件铁器无足轻重，但我却很看重它，这不由使人联想起 1945 年夏鼐先生在齐家文化的一座墓葬填土中发现了两片很小且非常简单的彩陶片，但就据此而推翻了安特生所论定的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结论。上述例证说明，本书作者将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开始年代定在公元前 13 世纪并非无稽之谈，相反，它会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如果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 13 世纪，那么将青铜时代的开始时间定为公元前 20 世纪似乎就有问题，因为那样的话，青铜时代的时间跨度仅有 700 年，显然是太短暂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考虑是否要将新疆青铜时代的开始时间提前。由于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尚未发现非常明确的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的遗存，故对此问题还不能妄谈，然而如果我们放眼世界的话，就会知道许多地方的青铜时代都是开始于公元前 4000 年前后。因此，就目前资料而言，新疆地区在公元前 2000 年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但其究竟开始于何时，似乎尚有待于今后新资料的发现。这个问

题还不仅仅局限于新疆地区，它还涉及对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认识。就此而言，本书的论点发人深省。

(5) 本书第一次从文化谱系的高度，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论述。关于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源流、相互关系及与其周边各有关文化的联系等问题，过去也有所论及，但都比较简单或空泛，而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理念来探讨这些问题，则应首推本书。作者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为线索，面向中亚乃至欧亚草原大背景，经过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和结论，例如：新疆在青铜时代是东疆的“带耳罐文化系统”和中西部的“筒形罐文化系统”东西对峙，总态势表现为西强东弱，影响和传播的大方向是从西向东、由北至南；早期铁器时代早段是全疆大部分地区的“高颈壶文化系统”和偏于帕米尔一隅的“圆底釜文化系统”相对，总格局是东强西弱，影响和传播的大方向变为从东到西、由北至南；早期铁器时代晚段则基本上看不到不同文化系统在新疆相互对峙的局面，而是呈现出趋同和融合的格局；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基本上是在当地早先青铜时代文化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而青铜时代文化的来源由于当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和确定，故顺理成章地将目光集中在周邻的青铜时代文化，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有些地方（如哈密地区）存在早于青铜时代的土著文化的可能性；在整个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新疆始终与周邻文化保持密切交流，但又相对自成系统，内部虽分不同文化，但交流日趋频繁，总体大同小异；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最终与汉文化、匈奴等草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东汉魏晋时期文化；新疆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之缓冲、交汇之熔炉，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并不止于新疆，而是经过新疆这个纽带向两端极力延伸，向东影响到中原地区，向西影响到中亚地区；在整个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既非“西风压倒东风”，亦非“东风压倒西风”，既不是“中国文化西来说”或“彩陶文化西来说”，也不是“中亚文化东来说”或“中亚彩陶东来说”，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这就是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前身等等。这些认识和看法或是发前人之未发，或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更深一步。总之，读罢此文，会使原来不太熟悉新疆考古的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总体面貌和架构，而专门从事新疆考古研究的人们如果不抱偏见的話，也会受到很大的启发。也许他的有些意见可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这是很正常的学术现象，由此而引发的学术讨论肯定会促进新疆考古学研究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上面是就本书谈了一些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对否？错否？留给学术界去评判和检验。本来，按照作者的能力和水平，这篇文章应该做得更好更充分一些，但是由于受客观条件和基本资料的限制，他的能量似乎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例如：分期研究中必须要

依靠的地层关系少之又少，即使有一两处，也很难准确利用；有些遗存的资料没有发表，即使发表了，也多不完整，利用起来颇费周折；他本人是第一次接触新疆考古资料，到新疆的实地考察仅有短短的一个月，所看到的实物资料比较有限等等，这些自然会使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不过即使这样，如前所述，本书也是难能可贵的了。我非常希望作者能以本书为启端，并在此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关注和进行新疆考古学研究，最好是能创造条件，亲自或指导学生带着明确的学术目的去进行一些遗址的田野发掘，既改变一下新疆地区长期以来只注意发掘墓葬而不重视发掘遗址的现状，同时再取得某些突破和进步。



1.兰州湾子遗址大型石构建筑



2.五堡墓地（中间可见被盗出盖木）

兰州湾子遗址和五堡墓地



1.周围环河



2.中间为已发掘区域